

T
ONG

同济规划

TONGJI PLANNING NEWSLETTER

求精·做实·解难·创新 简讯



06/2017 总第三十九期



URBAN

LANNING



同济规划 TJUPDI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同济规划 简讯

总三十九期
2017/06

E 卷首语 EDITOR'S LETTER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全球化、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城市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方面的不平等正在加剧。联合国新近出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及《新城议程》都将包容性发展作为重要议题。习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时表示：“面对当前挑战，我们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许多全球城市也把建设多元均衡、公平公正、流动活力、安全稳定的包容性社会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十三五规划”首次将“包容性发展”加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先决条件。可见，“包容性”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与“中国话语”。

时隔两年再次举办的“城市与社会”论坛，将“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作为议题，聚集来自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城市研究专家与社会研究领域专家，共同研讨国内外全球城市在包容性发展方面的理论建构与多元实践。本期简讯也以此为契机，将论坛内容整理成文以特别报道推出，以期对促成相关领域的跨学科、跨国界对话及交叉学科合作有所帮助。

“前沿观点”板块刊出了论坛主题报告的整理文，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的莎伦·佐金（Sharon ZUKIN）教授探讨了城市主要基于土地控制产生的多个维度与多重矛盾；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以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提出的包容性发展要求为出发点，指出了“建构全覆盖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包容性发展的未来政策重点”；美国三一学院都市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陈向明教授深入分析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对于全球南部城市化过程和策略的重要影响及其逻辑；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则以浦东新区“缤纷社区”项目为例，阐述了“城市多元共治的整合逻辑”。

“规划漫谈”选取的是“城市更新与协同规划”分论坛的一个新加坡案例，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的张道泉副教授，从新加坡公共艺术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公共艺术和公共项目如何能够帮助人们感受到来着社会的包容性。这对于我们来说，未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呢？

新时代的规划师，必将是包容性发展的响应者和实践者，在工作中践行具有包容性发展的规划，共同参与发展进程、共同享有发展成果，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求精·做实·解难·创新



目录

CONTENTS

新闻 NEWS	01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S	03
2017 “城市与社会” 国际学术论坛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	03
前沿观点 VIEW POINT	05
向上和向外的建设：探测和揭示中国在亚洲的城市足迹 / 陈向明	05
上海 2040：迈向卓越的和更为包容的全球城市 / 唐子来	08
城市多元共治的整合逻辑：以浦东新区社区治理为例 / 于海	10
社会可持续城市：自主性、融合与生存 / 莎伦·佐金	13
规划漫谈 DISCUSSION ON PLANNING	16
艺术地包容：通过公共艺术发展包容的新加坡 / 张道泉	16
“2017 遗粹影像摄影展” 入选作品 PHOTOGRAPHIC WORKS	19
喀什的人与城 / 王博	19

新闻

组织观看十九大开幕式并开展专题讨论会

10月18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总支组织部分党员，在总支书记王新哲的带领下前往同济大学大礼堂，认真观看了十九大的直播。下属七个支部的其他党员也分别在工作岗位或出差所在地收看了此次历史性盛会。

在观看和学习了习总书记的报告后，党总支于当天下午两点在规划大厦408会议室召集各支部党员进行了专题讨论，继续强化学习和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努力提升自己新时期规划业务能力和统揽工作大局的能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有为人民服务思想，更有为人民服务本领的合格的规划师。同时，微信也成为大家及时交流学习心得的桥梁，党员们在微信群交流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将会议精神迅速充实到工作中去。

(供稿：规划院党总支)

同济规划院参加精准扶贫乡村规划调研

应中国科协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邀请与组织，中国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尚武副院长带领中国乡村规划与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奚慧博士、规划师任超群等，随同规划学会组织的专家团队，于2017年10月24日共赴山西省吕梁岚县，就关于助力岚县王狮乡长门村精准脱贫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与座谈讨论。

在中国科协挂职岚县委副书记王保辉同志和长门村第一书记蔡钢同志的陪同下，专家团队与乡领导、村干部及村里的能人等共同座谈，就长门村的基本概况与乡村规划建设方面的需求等进行了讨论。随后，专家团队与地方干部一同对整个村庄进行实地踏勘，对长门村的人口、就业、农房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周边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解，并在考察过程中相互沟通与探讨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发展需求等。

当天下午，专家团队考察了岚县县城规划建设情况，应县委高奇英书记邀请，与岚县相关部门领导共同开展了美丽岚县城乡规划建设座谈会。在听取了有关介绍后，各位专家展开讨论，为岚县献计献策。规划学会石楠秘书长、省住建厅李锦生副厅长与张尚武副院长受邀担任美丽岚县规划建设顾问。

(供稿：中国乡村规划与建设研究中心)

第三届乒乓球比赛

2017年10月23-31日，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第三届乒乓球赛在同济规划大厦13楼开放空间举行，比赛分女子单打、男子团体两个项目，共有十四名女子单打选手和十一支男

子团体报名参赛。经过七天40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城市开发规划分院张洁获女单冠军，其余名次分别为：亚军杨娅琳、季军魏水芸、殿军程婷；男团最终排名，冠军为城开分院 & 都江堰分院联队一队、亚军是六所与耿慧志工作室联队，季军为城开分院 & 都江堰分院联队二队，殿军则是行政与城市空间联队。

乒乓球赛在提高员工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培养了职工的健身意识和团结意识。员工也纷纷表示这样的比赛非常有意义，并希望工会持续举办此类活动，展现同济企业精神和文化。

第十四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

2017年10月28日，“第14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隆重开幕。本届论坛由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会、《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参与联合主办。

论坛由开幕式暨2017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和《城市规划学刊》60年庆祝活动、主题报告和自由论坛3个板块组成。大会播放了《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办刊60年》的视频短片，回顾了主编董鉴泓先生坚持办刊60年，带领《城市规划学刊》成为中国城市规划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的峥嵘历程。随后，董鉴泓先生发表题为《我与〈城市规划学刊〉60年》的讲话。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孙安军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杨保军院长分别作了题为《空间规划的“知与行”——我国空间规划改革的思考》和《城市创新与规划创新》的报告。

参展 2017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和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

2017年10月15日及10月31日-11月2日，2017年“世界城市日”主题活动“2017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与“2017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以下简称“城博会”）分别在原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与国家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成“同济设计”联合展区，以“有温度的城市”为主题，通过社区营造、街道漫步、滨水休憩、文化生活和历史保护五个版块呈现并展示了同济在上海城市更新方面的实践案例。

在城博会开幕首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潮、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融、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书记崔明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伍江、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甘忠泽会长等多位领导先后莅临参观了同济设计展区，并对同济

设计在上海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济规划院 2017 年城乡统筹规划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7 年 11 月 1 日，以“城乡发展：地域性差别”为主题的 2017 城乡统筹规划研讨会在同济规划大厦 408 会议室顺利召开。研讨会由同济规划院城乡统筹研究中心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公平城市与城市治理高峰研究团队，中国城市科学学会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研究专业委员会，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部协办。

研讨会邀请了五位专家学者通过五个城市的案例，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城乡统筹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城乡统筹研究中心主任、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朱介鸣做了精彩的点评，并与与会者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供稿：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

2017 年 11 月 18 日，我国城乡规划领域最高水准的年度学术峰会——2017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有着“世界工厂”美誉的广东东莞正式拉开大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规划师们以“持续发展、理性规划”为主题，系统全面的交流全国及各地在城市规划研究、规划管理、规划设计和规划教育等领域的最新成就，探讨当前城市规划工作中面临的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俭教授、总规划师孙施文教授、唐子来教授、赵民教授，阮仪三教授的七篇论文入选了“40 年 40 篇论文”影响中国城乡规划进程优秀论文，这 40 篇论文以每 10 年为一个时段，着重原创性学术成果，不仅对我国城市规划学术思想形成、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具有重要贡献或重大影响，也对我国城乡规划编制、规划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出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 19 日、20 日的议程中，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党总支书记王新哲、副院长张尚武、总规划师唐子来、孙施文、戴慎志、王伟强、张松，资深总工程师陈秉钊，受邀担任多场专题会议、学术对话的主持人、主讲人或点评嘉宾。此外，规划师燕存爱与沈赟，也分别于专题会议：复杂与多元的城市更新、专题会议：城市规划历

史与理论，宣读了各自的入选论文。

培训动态（2017 年 10-11 月）

11 月 10 日，美国伊利诺大学城规系荣誉退休教授张庭伟受培训办邀请，带来了一场题为“城市时代的城市设计”的讲座，提出了“空间是为了用的，不是看的”，城市中的公共空间成为社会整合的载体，城市设计必须具有个性特色，特色要根据题目本身所限定的条件下，注重存量空间提升。城市设计不是出于空洞的概念，而是必须创造有实效的公共空间。

11 月 21 日，培训办邀请了香港理工大学建筑与房地产学系陈汉云教授，介绍了香港城市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的的经验，讲座从更新战略、控制机制、管理办法和公众参与模式等维度，分析了香港城市更新在过去 50 年中的演变历程。

近期方案中标项目（2017 年 10-11 月）

- 1、临沂市北京东路（滨河东路——长深高速段）沿线城市景观与城市设计
团队：教师规划设计所；项目负责人：汤宇卿
- 2、瑞安市城市中心区城市设计及控规修改
团队：教师规划设计所；项目负责人：周俭、梁洁
- 3、邢台经济开发区核心区城市设计项目
团队：城市开发规划分院；项目负责人：周海波
- 4、济宁市环城生态绿带总体规划 - 总体概念性规划方案征集
团队：城市开发规划分院；项目负责人：刘晓
- 5、长沙市菁华湖绿色小镇城市设计项目
团队：教师规划设计所；项目负责人：戴慎志

（供稿：投标办）

近期行业信息（2017 年 10-11 月）

-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建“中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的通知 / 国办发 [2017]90 号
-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批准盘锦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通知 / 国办函 [2017]111 号
-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批准嘉兴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通知 / 国办函 [2017]113 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批准新乡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通知 / 国办函 [2017]124 号
- 5、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吉林省长春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批复 / 国函 [2017]131 号
- 6、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通知 / 建规 [2017]212 号
- 7、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的通知 / 建城 [2017]222 号

（供稿：总工程师办）

2017 “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



2017年10月28至29日，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暨“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2017“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论坛由同济大学主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同济大学文科办公室和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共同协办，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公平城市与城市治理高峰团队及同济大学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同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的大力支持。

论坛基于2015“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和2016年20余场“城市对话”系列学术活动的成果，继续以促成城市与社会研究相关领域的跨学科、跨国界对话及交叉学科合作为目标，在理论建构、实证研究、规划实践、政策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学术交流。论坛聚集了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等

多个国家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议题，集中探讨了全球城市及中国城市展开的多元实践经验，以期为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参考。

28日上午9时，论坛在同济大学逸夫楼二楼报告厅正式开幕。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俭教授主持开幕式，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主任杨志鸣先生为论坛致辞。江波副校长在致辞中表示，此次论坛的时机、主题都恰逢其时。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明了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任务、目标和要求，其中提到城镇化、城市的发展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要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而讨论的焦点正是城市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同济大学特别重视和关注建设交叉学科的平台、促进交叉学科的协同研究，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城市与社会论坛是同济大学学科交

叉的一个重要体现。门洪华教授认为，2017“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以包容性发展为主题，彰显了三个不同维度的价值：同济大学社会学开放发展的跨学科价值、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学术论坛的实践价值。杨志鸣先生提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人居Ⅲ《新城市议程》为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了方向。2017年“世界城市日”响应《新城市议程》倡议，以“城市治理、开放创新”为主题。本次论坛作为世界城市日系列活动之一，汇聚众多学者，共同探讨城市的包容性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主旨发言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朱伟珏教授主持。首先，来自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的莎伦·佐金（Sharon ZUKIN）教授以“社会可持续性城市：自主、融合与生存”为题，探讨了城市主要基于土地控制产生的多个维度与多重矛盾：极端富裕和极端贫穷、环境破坏和可持续性、一元管理和多元参与、包容和排斥的共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以“上海2040：迈向更加包容的全球城市”为题，介绍了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提出的包容性发展要求，指出“建构全覆盖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包容性发展的未来政策重点”。美国三一学院都市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陈向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向上和向外的建设：中国如何推动全球南部的城市化”，他在发言中深入分析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对于全球南部城市化过程和策略的重要影响及其逻辑。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则以浦东新区“缤纷社区”项目为例，阐述了“城市多

元共治的整合逻辑”，认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资源的整合——即物质的、组织的、符号的和正当性资源的整合。

28日下午，分别以“社区融合与治理创新”、“社会空间与社区研究”和“文化认同与包容发展”为主要议题的三个平行分论坛同时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D楼5楼展开，分别由同济大学朱伟珏教授、复旦大学刘欣教授、美国三一学院陈向明教授主持，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展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社区凝聚力、社区认同与治理、社区空间结构、遗产再利用等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王郁教授、同济大学朱介鸣教授、复旦大学胡安宁教授、同济大学黄怡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尼昂塔分校梁浩翰教授、上海大学刘玉照教授等六位评议嘉宾作了精彩的点评，并与各位发言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29日上午，以“全球城市与东亚经验”和“城市更新与协同规划”为主题的两个平行分论坛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举行，复旦大学于海教授和同济大学周俭教授分别担任了两场平行分论坛的主持人。在“全球城市与东亚经验”分论坛上，来自多个国家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分享了首尔、新加坡、滨松、洛杉矶、上海等城市发展的经验研究。“城市更新与协同规划”分论坛上，九位中国学者就中国城市更新问题及相关的规划创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法国社会科学院劳伦斯罗兰-伯格(Laurence Roulleau-BERGER)教授、日本立教大

学黄盛彬(Seongbin HWANG)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张道泉(Tou Chuang CHANG)副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陶希东教授和同济大学杨辰博士等六位作为评议嘉宾参与了两个分论坛的讨论，发表了精彩的观点。

本次论坛在前两年论坛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共同探索城市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之路。



开幕式及主题论坛现场



“社区融合与治理创新”分论坛



“全球城市与东亚经验”分论坛



“文化认同与包容发展”分论坛



“城市更新与协同创新”分论坛



“社会空间与社区研究”分论坛

向上和向外的建设：探测和揭示中国在亚洲的城市足迹

陈向明 美国三一学院城市与全球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和区域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全球化这个大的范围靠得比较近，但是我还要把分析焦点落到比较具体的地点、空间上，这样既有一个广义性，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要平衡面和点的关系。

我这一两年来在对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大的过程当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进行研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比较新的题目超越了、或者说离开了城市研究的普遍领域。但是由于今天这个会跟城市研究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所以还是回到城市的这个维度上。下面几个问题虽然比较简单，但也很难回答：

- 1) 中国是否先在国内建设城市，然后扩展到国外？
- 2) 中国是如何做的？
- 3) 这件事（建设城市）对于全球南部（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影响是什么？
- 4) 这有什么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的崛起与全球发展

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建了很多新城市，建的很高，可以说是“向上建”，很多老城市在重建了，规模非常大、速度非常快、国家的作用非常强。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政府引导城市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后、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影响，该怎么来看？我用这样一个副标题，意思是说，中国城市化往外延伸

出去以后，也就是说“向外建”，哪些因素对城市化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哪些因素产生间接的影响？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

我今天讲的个案城市，基本都远离上海和高度发展的东部沿海城市、远离全球超大城市，是一些边远地区的、边境的小城市，包括一些镇。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在边界上、或者边界地区中变化，而变化最主要的动因来自政府推动——我们国内的城市化高速发展、然后从东向西转移的一方面。

（一）中国在全球南部的三角式影响

中国城市化的模式是不是更大一些、能不能成立？还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只是一种范式、一种规范？它有它的特点，使我们重新考虑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这三个主体过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三者之中的关系就是中国和全球南部、或者说全体发展中国家——四个地区，亚、非、拉、中东的关系。我初步写了一些文章，去探讨中国对这四个地区的城市的直接影响究竟在哪个尺度上、哪个地点上。我们又选了四个不同的行业，从商品（Commodity）、制造业（Manufacturing）、能源（Energy）和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这四块儿来讲，今天特别要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二）“一带一路”激起的城市发展趋势

和理论挑战

“一带一路”也对城市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我们以前城市化的研究往往是注重一种垂直的格局的研究，注重纽约、上海，偏重研究一些对全球经济制高点影响大、功能强的城市；我现在希望我们的研究慢慢转向全球南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中小城市最近二三十年全球经济化的潮流下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不太重视的地区，现在由于“一带一路”的带动和其他边境城市的崛起，使这些城市、历史上的文化名城重新发挥它经济上、在物流上、在其他各个方面功能上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以前注重港口、河港城市，现在要看到一些内陆的城市——它们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一些以前不太重要又缺乏研究的中小城市应该进入我们研究的视野。

二、理论视角：局限与价值

下面我想简单回顾一下城市研究理论上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首先，国家为主导的观点和权力下放、城市去中心化（Decentering）的观点。其次，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边缘地区、边缘城市的边缘地区，它们之间空间关系的转变，比如出现以前没有的跨境的新腹地，我们要探讨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再次，区域的观点，看城市传统中心和腹地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边境地区拿进来谈的话，中心和边缘地区腹地的关系是有哪些不同的？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

Brenner 教授提出一个“星球全球化”，是一个超越“全球城市化”的更大的尺度。他也提到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模糊、以前边远的地区慢慢的也被吸引、卷入到全球城市化的过程。最后一个很关键的观点，英国伦敦学院的地理学家 J. Robinson 教授提出“普通城市”的概念。所谓“普通城市”，包括以前被忽略的、现在开始快速发展的城市——要研究这些城市，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要看到它们发展的过程和发展产生的影响。

三、发展与城市建设

东部沿海地区是城市化最早起步的地区，逐步向西部扩散，伴随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收入、经济、社会、环境的破坏上，都有很大的区域空间的差别。在中国的体制下，克服、减低、调整这种发展不平衡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的推动，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的政策。在这些大政策下，以基础设施为引导、以自然资源开发为手段、以国际贸易为推动的城市发展过程。我们要看自然资源的开发，要看边境贸易的发展状况和规模，同时要看交通设施的发展和对不同区域城市的影响等。

第二个区域是中部和西部，第三个区域是中国西边和西南边境周边的亚洲地区。要关注这三块：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这三个地区与中国西部、内陆接壤，远离中国沿海地区，它们的发展直接受到我们沿海地区长距离的逐步扩散影响，发展既是连接的、同时又可以转换，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是从沿海向内陆空间之间的资源的重新调整、移动，赋予传统的交通设施以新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出来，中国在这三个地区的中心点上，它的力量向外扩散了以后，开始为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很多相对落后的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发展机会。下面我就简单讲中国对这三个地区

的影响。

（一）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中国从西南地区对东南亚城市发展的影响。第一当然是铁路。云南省内铁路跨境以后，经过老挝的万象，然后和曼谷的铁路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大的铁路网。我们发展的模式就是搞运输，造高速公路、铁路是为了促进原材料和人员的流动、制造业的发展。

云南境内的澜沧江已经建了很多大水坝，现在整个湄公河的下游，上游在云南和老挝境内已建成一些大坝，开始对下游的柬埔寨和越南境内的城镇和农村产生不良影响。这样的上下游的关系，对各方面影响非常大，包括下游的鱼类减少，稻田减产，甚至加剧出海口大城市（包括胡志明市）面临的海水上涨危险。此外还有输油输气的管道，从缅甸的南部沿海、经过瑞丽到昆明，沿途影响当地农村的生活方式。从森林资源来讲，缅甸的红木是中国红木家具的一个主要来源。中国人收入提高以后，这些年来对高等红木家具的需求也是非常强的，这种特定的跨境需求带动了中缅边境地区的伐木小镇的发展，自然资源的急剧开发对城镇化产生了影响。

第三，东莞-金边的制造业联系。我今年夏天到东莞和金边做了一个企业的两地调查，发现东莞鞋业的厂子，以前规模两三千人的已经缩小到只有五百人左右或者更少了，但它在金边建立了一个有一千人的大厂。柬埔寨受到中国由内向外推动的影响以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类似于中国早期的大量农民工进城的现象，只不过它的规模比较小。柬埔寨原本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城市化水平——这些国家一般只有首都和最大的城市真正有城市的规模，但当前它的城市已经逐步出现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并在市中心边缘地

带建了工业区。

第四，金边想要向深圳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他们的官方的口号就是，要“学习深圳”，反映出城市未来发展很高的定位。虽然在市中还是能看到传统佛教建筑，但是也有很多新的大型建筑在建造中。这种比较照搬的学习中国城市建设方式，在本地城市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就会有问题，比如贫富空间的平等。

（二）中国对南亚的影响——中巴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南端的起点是瓜达尔港，多年来基本上是军港，而且很少使用，使用能力很低，但现在中国进入以后，极大提高了它整体的功能和实力，远洋轮进来以后，直接上公路、以后铁路也可以到新疆，但这里面还有不少发展障碍，比如电力短缺，所以中国也在帮助建发电厂，如果供电稳定，可以促进巴基斯坦更好的发展制造业。

中巴经济走廊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热电厂、太阳能发电站，电厂的工程完成了43%。这个发展过程并不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巴基斯坦的城市，但它的基础设施是整体协调发展的，最终会使一些关键的城市发展起来。比如拉合尔，巴基斯坦北部的历史的名城，经济作用相对来说滞后——巴基斯坦的经济中心是南部沿海的卡拉奇。

为什么瓜达尔港这个地理位置重要？巴基斯坦左边就是伊朗。印度非常担心中巴之间经济长久的友好的发展。所以印度现在开始跟伊朗合作，促进伊朗离瓜达尔港只有70公里的恰巴哈尔港的发展，跟瓜达尔港口竞争，让恰巴哈尔港成为印度在欧亚大陆南北走廊的海口。因为中巴经济走廊这条线连起来以后，公路、铁路、输油管道、发电，使卡拉奇这样一个经常断电的城市能够逐步达到24小时不停电，

使它比较集中的制造业逐步发展起来，与印度竞争。另外，印度更担心瓜达尔港口会让步，使得中国海军能利用它在印度洋占有一席之地，对印度构成安全威胁，所以这两个长期被冷落的海港现在也成了中印两个大国在印度洋竞争的场所。

（三）中国对中亚的影响

1. 能源连结

为什么我们以前很少注意到中国和 中亚城市区域层面的关系？这个地区是油气资源最富足的地方，这些管道直接从西到东，一直延伸到香港、上海——沿海的重要的制造业实际上需要从中亚过来的能源。这些城市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经过的驿站，现在成为跨境油气管道的连接点。阿拉山口这个城市只有两万人左右，建市只有三年，但有一个油气枢纽站，这个非常重要的机构调节进境的油压，再将原油继续输送到中国从西到东的油管里，最终供应沿海特大城市。

2. 中欧列车

我们还可以通过铁路来看中国和 中亚的关系。中欧列车现在有两个出境口，一个是霍尔果斯，一个是阿拉山口。火车经过阿拉山口的时候，要用起重器把火车的集装箱从窄轨换到宽轨上，然后继续向西延进。很小的阿拉山口市已有多条轨道，每天可以有很多班次的车过来。霍尔果斯也一样，中欧列车的通过帮助这个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小集市发展成了有 8 万多人 口规模的一个现代城市。

中欧铁路建起来以后，慢慢又给那些制造业已经开始有点衰退的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机，因为它们的产品可以直接通过内陆运用到中亚、运用到欧洲。中国铁路长距离的运输，也会给一些西亚城市带去越来越多日用必需品。如果以后铁路能够进入西亚、南亚，延伸到伊朗、阿富

汗，中国和南亚西亚的贸易的关系会越来越强。

3. 迅速发展的边境城市霍尔果斯

霍尔果斯本来只是新疆的一个边陲小镇，城内的高层建筑基本都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但它的规划发展目标是很大的，以后要发展制造业、服务业、物流等，很快会成为“一带一路”上的一个重要结点城市。这里有一个义乌商贸城，它的规模非常之大。我在当地调研期间看到哈萨克斯坦的小商贩可以在中哈边境合作贸易区里面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加强跨境贸易，促进中国和 中亚邻国的整体贸易。这也代表了 中国东部城市的特种功能向西延伸，给霍尔果斯带来了类似的跨境贸易联系功能，并更直接的辐射 中亚周边地区。这和上面表中列的义乌 - 马德里列车货运起到了辅助作用。

四、初步小结

我通过这次演讲把研究范围局限在 中国西部边境相邻的三个大的亚洲区域：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初步比较分析了这三个地区的各种物流、流动的关系，简单小结一下，深入研究还在下一步。今天讲的东西都和土地有关系，廉价快速的土地开发是 中国城市化的起点动因，城市建设实际上是 中国国内城市化带来的政治权力的推动、经济权力的促进、通过空间权力的影响，它已经超越了 中国城市化早期的以沿海大的港口城市推动制造业出口、而是呈现向外扩展这样的发展格局。这种发展格局最终的影响会使全球南部的整个城市系统、城市结构多样化，使早期被忽略的、边陲的、边缘的城市重新融合、渗入全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加强这些城市的作用，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

通过这样一个分析过程，我们看到，

理论上要从最早萨森教授讲的全球城市逐步转向研究更多元的全球南部城市。我们不 只是用西方早期的理论观点来分析城市，而且要把理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分析视角转向全球南部城市，转向像 中国这样对发展 中国城市的发展、研究影响最大的国家。我们不 只是对照、检验理论，而是要移动理论的出发点。这个移动的过程是，大的空间格局下我们的城市由西向东逐步延伸的过程，所以我们理论的发展要跟踪实证研究——实际上的理论的区域化、通过从国内到国际之间的边境区域新格局的分析，才能够证明全球城市化、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发展这三个大的过程之间的一些新的穿越城市，同时我们也比较清楚的看到 中国城市化已开始影响周边的亚洲城市和地区。我希望我今天讲的一些东西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思路、新启示，使我们今后的城市研究有一个更富有全球和比较视野的新方向。

* 发言者注：以上内容也是本人今年 11 月初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南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和 中国城市问题（上海）论坛的几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在此对各家学术单位的邀请一起表示衷心感谢。

此处刊登有删减，完整版见“TJUPDI 同济规划”微信公众号。

录音稿：曾牧之、李嘉诚
编辑整理：邓世碧
经发言人审校

上海 2040：迈向卓越的和更为包容的全球城市

唐子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规划师

卓越的全球城市，要义之一就是包容。一个不包容的城市是不可能迈向卓越的。包容性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于可持续城市化的共识。联合国人居三的《新城市议程》强调，人人共享的城市（cities for all）是更美好和更永续未来的共同愿景，即人人都有平等权利，能够获得城市提供的福利和机会。中国政府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强调，以人为本和公平共享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原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重要举措之一。

一、城市规划的范式转型

传统的规划是精英规划，我称之为“5%的规划”，因为5%的社会精英决定了城市未来的发展命运。现在进入治理（governance）时代，我们需要民主的规划、寻找公共利益，或者说寻找最大公约数。规划作为公共政策需要得到至少51%的社会大多数认同。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公正的规划，不仅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还要同时兼顾不是多数、而是少数的弱势群体（15%）。我认为，并不是公正的规划就要替代民主的规划、或者民主的规划就要替代精英的规划。城乡规划既需要社会精英（5%）的价值引导，又必须满足大多数人（51%）的利益诉求，也要兼顾不是多数、而是少数的弱势群体（15%），形成社会各方都能够广泛参与和达成共识的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

美国学者 R. Florida 写了一本书《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里面讲到“创意城市发展的3T理论”。第一是技术（Technology），他用了高科技指数（High-tech index）来测量；第二是人才（Talent），是指城市常住人口中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重；第三是宽容（Tolerance），用同性恋指数反映，一个城市的同性恋者比较多，说明这个城市社会比较包容。如果一个城市社会比较包容的话，就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我的理解逻辑是：首先是社会宽容，因为只有社会宽容，才能吸引人才，有了人才，才有可能形成科技产业。

最近几年上海在社会治理中比较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旧区改造的事前征询制度。第一轮是征询旧区改造立项意愿，愿意改造居民户数超过规定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居民总户数的90%），才能办理旧改立项、规划等手续。愿意改造居民户数未达到规定比例的，暂停改造。第二轮是征询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如果签约户数未达到规定比例的，暂停改造工作。这是一个鲜活的案例，表明政府在旧区改造中采用社区自治方式，如果绝大多数的社区居民不认同，旧区改造的推土机是不能够进场的。

二、解读《上海 2040：迈向卓越的全

球城市》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上海2040的总目标，三个愿景包括繁荣创新之城、幸福人文之城和韧性生态之城。我们可以归纳为3E模型，经济繁荣（Economy）、社会公平（Equity）和环境友好（Environment）分别对应以上三个愿景。我们可以考察幸福人文之城市维度的四个内容，包括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激发城市文化活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彰显城乡风貌特色。

我们可以再考察“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我关注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包容性发展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基本公共服务包含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到2040年，无论你住在上海的哪个地区，在15分钟的步行范围内都可以享受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这就是上海2040所强调的，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向现状公共服务水平较为薄弱地区的倾斜力度，逐步消除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衡性，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便利性与覆盖度。至2040年，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将达到100%。

三、规划研究议题：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和分析

我正在领衔一个城市实验室，其中的一个研究项目涉及如何评估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均等化，课题名称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和分析”。我们研究了上海的三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社会绩效：一是轨道交通网络，二是公园绿地，三是公共设施。下面介绍针对轨道交通网络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会公平正义是 1970 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 (Political Philosophy) 的核心议题，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是两个层面的发展理念。在第一层面上，社会公平理念 (fairness) 建立在各个社会群体的能力 (abilities) 和需要 (needs) 是相同的基础上，因而注重人人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在第二层面上，社会正义理念 (justice) 强调各个社会群体的能力和需要是不同，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向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因而是更具有进步 (progressive) 意义的社会发展理念。

我国大城市正在经历着社会阶层分化 (Social Stratification) 和社会空间极化 (Spatial Polarization) 的“双重过程”，越来越多的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外来务工人员正面临着社会地位和空间区位的“双重边缘化”。城市规划对于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产生决定性影响，无疑是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领域。在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基本公共设施的配置需要建立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绩效评价方法。

我们的研究范围是上海市中心城区及其连绵拓展区。轨道交通网络分布的社会公平绩效 (fairness) 就是轨道交通网络分布和全体居住人口分布的“空间匹配” (spatial match) 状况，社会正义绩效 (justice) 就是轨道交通网络分布和特定社会群体分布的“空间匹配”状况。

我们借鉴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的方法，建立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公平绩效评价方法，可以进行历时

性比较 (一个城市的纵向比较) 和共时性比较 (几个城市的横向比较)。如同测度收入分配状况，基尼系数的取值区间为 0-1。基尼系数越小，表明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越是平等，意味着社会公平程度较高；反之，则表明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社会公平程度较低。通过居住人口分布和公共设施分布的“空间匹配”状况，评价公共设施空间配置中社会公平的总体绩效。

2010 年上海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网络资源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为 0.394。由于目前国内尚无同类型研究，缺乏比较基础，但基尼系数为同一城市的历时性比较和几个城市的共时性比较提供了研究基础。如果参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评价标准，基尼系数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 至 0.3 之间表示收入比较平均，0.3 至 0.4 表示收入相对合理，0.4-0.5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洛伦兹曲线 (Lorenz Curves) 采用图解方式，表示公共服务资源在居住人口中的分配状况，如同表示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可以考察一定比例的居住人口享有一定比例的公共服务资源。轨道交通网络资源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中的分配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对于享有轨道交通网络资源较少的常住人口而言，10%、20% 和 30% 的常住人口享有轨道交通网络资源的比例分别为 0.9%、4%、9%；对于享有轨道交通网络资源较多的常住人口而言，10%、20% 和 30% 的常住人口享有轨道交通网络资源的比例分别为 26%、44%、56%。

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还需要关注社会正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应当向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基于人口普查变量的社会属性 (如职业、户籍、年龄、性别等) 可以将常住人口划分为不同

的社会群体。根据各个社会群体占常住人口比例和社会群体享有公共服务资源比例的份额指数 (Share Index)，可以评价公共设施空间配置的社会正义状况。

基于社会正义的理念，与公共设施相关的特定弱势群体享有公共服务资源的份额应当至少不低于社会正义理念的底线要求。同样，各个社会群体享有公共服务资源的份额指数可以进行历时性比较 (一个城市的纵向比较) 和共时性比较 (几个城市的横向比较)。

研究范围内低收入群体享有轨道交通网络资源比例为 27.0%，而低收入人口占全体常住人口比例为 27.9%，则低收入群体享有轨道交通网络资源的份额指数为 0.968，表明低收入群体享有轨道交通网络资源的份额略低于社会平均份额，但与社会正义理念的底线要求相差不大，社会正义绩效处于基本合理区间。

随着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日趋显著，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分布中兼顾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进程中，幸福人文之城的核心理念就是包容性发展。

录音稿：李金怡、张艺

编辑整理：邓世碧

经发言人审校

城市多元共治的整合逻辑：以浦东新区社区治理为例

于海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我就“自治”一词的翻译问题，请教了好几位学者，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说法，同时也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叙述的理路。这里用了“多元共治”这个词，简单来说就是社会治理。现在的“治理”（Governance）所指的，不是政府一家对社会负有管理责任，而是意味着有很多的行动者。在福柯那里，Governance和Government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在中国今天的语境下，已经开始变化了。用中国的语境，“Governance”一定是大家一起管理；而中国原来试验的是“Government”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城市多元共治”有那么多行动者，怎么整合起来？我今天用浦东的三个案例来支持我的论点。

一、社区自治办的两个整合逻辑：管理逻辑和自治逻辑

先看两个文本：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摘自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20171018）

“浦兴治汇力之社区花园培训项目是街道基于可食地景、社区营造、健康生活等先进理念，为了增强社区互动，激发社区活力，以社区花园营造为主题的特色技能支持服务项目。”（摘自“浦兴协商

居民自治”20170929）

第一个我们很熟悉，最近都在学习，“美好生活需要”、“依靠人民”是关键词。这应该说是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文本了。第二个大家一定不熟悉，是浦兴协商居民自治，是一个浦兴街道自治办的微信号。大家注意一下时间，9月29号，显然还没有看到十九大报告。我觉得这两个文本里面体现的精神是一样的：我们的最高级别的文本说“美好生活需要”，那浦兴问什么是美好生活呢？他们把“可食地景、社区营造、健康生活”、“先进理念”放入其中，也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规定，对吧？下面特别提到，他们要找一家专业组织帮助居民实现这些想法，浦兴街道和社会组织，做的都只是“支持服务”。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自治办。二十年前，我在上海推动了一项居民自治研究。这个研究报告完成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和评审专家有一合影，日期是1997年12月27号。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卢汉龙，做社会学的都知道，他也是最早做上海的街区研究的，街区制；谢遐龄是复旦社会学系的主任；吴铎，也是做社区研究的；还有李亚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和马伊里。马伊里是当时上海浦东新区的社发局副局长，她是上海最早支持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的政府官员。上海大学的沈关宝教授，是费孝通的学生，他写了《社区研究》；徐中振，他是上海社联组织社区研究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第三

域的兴起》这本书是我跟李亚平主编的，是国内第一本编译国外社区组织、志愿者工作和志愿组织的书，1998年出版。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二十年前我们讲社区研究，很时尚、但是没人听，基本上被忽略了；但是今天已经有了社区自治办了，风向发生了转变。

（一）美好生活的世界历史方案和中国革命方案

“美好生活”并不是一个学术概念，但是无妨，因为我们已经把它作为新时代的一对矛盾特征的一方。“美好生活”内容很多，不妨看作与幸福生活等价的概念。这也是我二十年前的观点，我在那个报告中提出：从世界历史来看，西方讲信仰拯救，到了近代靠什么？市场；然后市场出现了问题，接下去靠什么？国家——西方发展福利国家。但是国家发展到顶点就是全能主义的国家，所以最后发现国家也有问题。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所谓“第三域”（现在都叫“第三部门”，但是用的英文是一个词，Third Sector）。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方案。可不可以有“社会拯救”？不知道。所谓“社会拯救”，就是第三域发展起来，看能不能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做到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中国差不多是一个全能主义国家的方案。1949年的革命，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解决市场的问题、解决资

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一个革命的方案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包括经济、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所有的东西。让我们用当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的话，看看这个把社会都管起来的方案是怎样的，“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李先念说的只是把全国人的粮食都管起来，而这必须是公有的才能管起来。所以1949年以后几场运动都是在推进把资源把人都管起来的目标，包括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农村的集体化——只有把所有的资源全部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时候，才能推进革命方案。所以毛泽东说，“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大家想到这些方案，再想到今天的自治办，是否觉得风向有点变化？

（二）社区自治办的两个整合逻辑

我们讨论“自治办”这个词怎么翻译。我想用Autonomy，但是它较多政治的概念，讲居民自治应该是Self-governance。而这个办公室本身不是Self-governance——政府的部门怎么能说是Self-governance呢？只能说政府创立了一个Office，想要推进Self-governance。所以我最后翻译成Office for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我觉得这个翻译可能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今天街道的自治办还是一个政府部门，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想要推进居民的社区自治和社区参与。所以就引出了两个问题：居民自治为什么需要政府办公室？地方治理为什么需要居民自治？我认为在浦东的社区治理过程当中存在两个逻辑：一个逻辑偏向政府管理和服务，另外一个逻辑偏向让居民自己有创意。我找了案例，这两个逻辑

之间有张力，但是我们要看在中国国情里它们如何互补和共存。

二、浦东新区的三个案例

（一）案例1：立邦“为爱上色”——民间公益的政府整合

大家知道，立邦是一家企业，他们想做好事——做好事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不管。大家想到墙绘、涂鸦，让外国艺术家在上海居民楼墙上“涂鸦”。但是弄得不好，还要因为破坏社会治安被公安局抓走，总是有很多问题。他们要做好事、要“上色”，需要政府给他们保驾护航。

立邦为爱上色，谁为立邦背书？这里有很多问题。因为请来的大部分是外国艺术家，这让人很紧张，画了什么东西更让人紧张。到哪里找墙壁？他们说找了一百面墙壁，只有十五面画成的。要在别人的墙面上画，很难取得同意。

“拒绝的原因之一是这些管理机构拿不定主意，需要‘上面’的同意。今年我们获取墙面时，在后期比较顺利，是因为得到了区里面一些领导的支持。刚好有缤纷社区的项目，在政策上为我们的项目提供了帮助。焦秘书长把我们这个项目纳入缤纷社区项目中去，他觉得我们的项目与缤纷社区相契合。从而我们的项目得到区里的支持。我们的第一面墙在商城路，画了一个小熊猫。他知道后，在一个内城缤纷社区项目启动会上分享了我们的项目，恰好张区长听到了分享，且与他‘街区可漫步，建筑可阅读’的理念相契合。例如之前提过的小熊猫墙绘，艺术家是国外的，但画中融入了许多中国元素。”（邱睿，立邦为爱上色公益执行团队负责人）

“这件事情机构拿不准，必须上面同意”反映出，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已经很深入了，但基本上还是Government，不是Governance。在中国把这么多的力量整合起来，一定要有一个开明一点的领导，

他说好，那下面就一路绿灯，这就是中国故事，也叫中国方案。等到上面赞同以后，事情就好做了。邱睿又特别谈到，有一位基金会秘书长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个民间公益一开始做的项目叫“为爱上色”，最后秘书长说可以把这个项目变成一个浦东新区区长、副区长所倡导的、浦东新区内城五个街道做的城市微空间改造，叫“缤纷社区”——这是政府项目，只要搭上的话，就有了通行证了。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民间的创意一定要得到政府的背书，背书给了他们合法性。

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三个重要人物：第一个就是企业家，立邦的企业家；第二个是浦东新区的副区长，第三个就是给他们牵线的前秘书长。获得政府负责官员的首肯对于做项目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二）案例2：福山路跑道——基金会的双重角色

第二个案例是浦东的福山路的一个步道。这是一家健身房，健身房外面的路已经一塌糊涂了，路高低不平、下雨有坑，然后有蚊子、有遛狗的，没人管。所以对他们生意不好，企业家说要把这条路改造一下，结果浦东陆家嘴公益基金会觉得，可以做好一点、做成一个健身步道，孩子可以在这儿玩；在天气好的时候，健身房也可以把他们的某些训练拿到外面来做。基金会在这件事情这里面既起到了办公室的作用，又起到了Self-governance的作用。这句话是前秘书长自己说的：

“我们基金会在三月份一开始做跑道的时候，没想到要这么深入地介入到空间改造的这个业务领域。主要是想着让居民参与进来，想着我们把这个项目提出来了，设计出来了，等着政府去购买乙方去实施。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发现必须得由我们自己去和各方联系，最后我们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发动者，还是协调者和组织者。”

(焦兴旭,原陆家嘴社区基金会秘书长)

(三) 案例3:浦兴社区花园营造技能支持服务——多元共治发展居民自治

最后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初看到的那个文本,浦兴的居民想在自己的社区美化环境,做社区花园,但是没有技术。社区自治办说会找专业团体给他们培训,手把手教他们怎么栽培、怎么堆肥、怎么管理、怎么护理,目的是最后让居民自己维护社区花园。这是一个比较实实在在的由社区自治办推动居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一个案例。以下是浦兴街道自治办主任代敏写的:

“我在社区工作了13年,从民政岗位开始接触自治工作,深信‘人’是居民自治最大的财富。但光有‘人’不行,还要找到技术。居民自治如果缺少程序、技术和方法,再好的理念都没有落地的可能,再厉害的人也不过单打独斗。我认为,民主参与的热情和意识不需要过度动员,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社区自治缺乏科学、规范的公众参与制度,公众需要对话、协商、议事能力的培训。

我们街道一直在努力向专业‘借力’,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

政府引导社区自治的目的是要还权于民,如果社区事务都能像金桥湾项目一样还权于民,今后自治办的事务性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少,更多需要协商应对的新情况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私下里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商量办,社区的事‘商量着办’。”(代敏,浦兴街道社区自治办主任)

所以她找到了同济大学景观系的刘悦来老师提供社区花园的技术支持。这两个关键行动者,实现了“政府引导、居民主导、技术指导”的共治逻辑。大家知道“居民主导”和“政府主导”这两个逻辑里面的张力,这个案例当中的确是居民主

导——居民学成之后,还是要居民维护下去。所以美好生活要靠他们创造。

三、小结

我们的核心问题是:美好生活是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基本生活保障,但是有了基本保障以后,生活一定美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思考什么是幸福?如果说美好生活是创造出来的,那谁能代替你创造?——这就是我们自治的最好理由啊。最后,居民参与和自治发生的场地在哪里?不是在政治的场域、不是在他们经济的场域,而是在他们生活的世界。所以我们要把美好生活的概念引到社会学的生活世界、引到城市学的生活空间的概念。哈贝马斯、舒茨的著作里面特别提到,思考生活实践。从一元管理到多元共治的转变,意味着政府已经意识到,事实上今天有很大一块领域是它管不到的,应该让居民自己管。我想,我们发挥政治报告所言的“美好生活”的创造,必须要从自我创造、自我管理的角度来讨论。

我认为人的事情就是两件:一个是活着,政府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一个是活得自己觉得滋润觉得幸福自己觉得美好,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创造的事情。政府讲“活着”,居民自己讲“活得好”。所以专业机构在共治过程当中不断培训居民的自治能力,最后要靠居民自己来创造。这段话是21号写的,手里面已经有了政治报告了,也是在微信号上写的,我们要特别提到中间这段话。

“社区花园项目,是共建共享“大爱浦兴、美好家园”载体之一。这一回应居民需求的过程,离不开政府持之以恒地努力、离不开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参与、更加离不开广大居民朋友的承载和担当。美好生活是我们的选择,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也必将由我们共同去创造。”(“浦兴协商居民自治”,20171021)

这是最后的总结:民众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体逻辑,与政府整合资源的主导逻辑,既有张力,也有互补;浦东案例,为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想象的空间。

录音稿:覃丹

编辑整理:邓世碧

经发言人审校

社会可持续城市：自主性、融合与生存

莎伦·佐金 美国布鲁克林大学社会学系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 教授

你们或许知道，城市社会学家对于城市的未来并不像城市规划师或者政府官员那么确定，我们是那些提出启发性问题的人。我们会提出，如果要实现幸福、安全、包容和可持续，有哪些问题必须被解决。我今天的演讲尝试解构“城市是什么”，提问“当前的城市环境是什么”，“对于世界上的城市，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可以在合作的讨论中引入哪些比较”？城市是经济、文化、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发生之地，面临着如何整合地方利益和全球利益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全球化的进程会对地方社会整合模式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一、比较是可能的吗？

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可能进行城市之间差异性的比较？即便我们没有机会去到世界上的很多城市，但我们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他们的形象，并发现对这些形象如此熟悉，甚至是某个全球城市的某个具体地点的形象，都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因此我们不仅在视觉上对这些地方感到熟悉，同时也看到了全世界城市景观出现千城一面的形象：出现在世界某个区域的高楼大厦，逐渐地扩散到其他地方；兴起于香港、曼谷的城市购物商场逐渐出现在上海；在过去二至五年里面蓬勃发展的联合办公空间、创业孵化空间等，也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存在一种全球性的城市话语（Urban language），至少对于大多数受过良好

教育、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城市人群来说是很熟悉的。

但是也有一些令人伤感的城市形象在全球变得人尽皆知：比如遭受自然灾害的城市形象，展示出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问题。很多城市都建立在水滨——河边或者海边，在纽约、上海、伦敦，在世界上很多的城市，人们面临这样一个紧迫的问题——当我们还不断在水边建造新建筑的时候，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城市？

我们对于战争的形象也记忆犹新，希望不要在自己的社会中看到战争，也为世界其他地方被摧毁的城市感到悲哀。

我们同样非常熟悉那些被用来展示市民要求的中央公共空间的场景，无论是6年前的开罗解放广场、还是发生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的情景。全世界都对这些场景很熟悉，我们不能、也不该忘记它们，因为它们生动地展示了城市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人们对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

在一个城市化的世界里面，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21世纪，预计81%的人口都会生活在城市里面。如果你去看美国最优秀的地理学家们的作品，你会发现“城市”的定义有非常强的功能主义色彩，很多大的要素汇集在一起，同时又互相分离。城市集中了各种各样的资源，也有运行良好的各种专门化行为，还包含了远远

高于其他人类聚居类型的多样性——经济、人口、文化类型、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有两种不同的城市文化都被称为“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比较传统的一种是“世界性地极致化”（Worldly sophistication）。21世纪的上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对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对于自己直接接触的环境之外的世界了解更多。过去二十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移居到城市、越来越多的跨国移民发生在欧洲、美国、非洲、拉丁美洲的城市中，“世界主义”的另一层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那就是世界性地融合（Worldly integration），这层含义表明，城市的文化也是全球的文化，是由不同的移民文化所组成的。

所以，城市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是物质的景观，尤其一个建成环境；它是人的功能性地聚集，包含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它还是不同于郊区、近郊以及农村的一系列文化形式。但同时，城市本质上也是充满矛盾的：城市环境是不是脆弱的？因为我们是如此依赖电力、数字化沟通、驯服自然环境。城市是不是有弹性的？因为人口集中。城市是好还是坏？

我今天的基本问题就是，城市的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意味着什么？

（一）具体的悖论

我的朋友 Robert A. Beauregard 是一位城市规划专家，他在新书《城市时代

的城市》(Cities in the Urban Age)中谈到,城市包含四个主要的悖论:第一,城市聚集了最多的财富,与此同时又展现出非常明显的贫穷;第二,城市具有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力,因为我们使用、而且浪费了太多的资源,但城市又具备规划更好的可持续环境的能力;第三,城市通常由精英团队或者寡头来管理,但同时城市又是人们聚集起来表达民主诉求的地方;第四,在城市中,人们包容陌生人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互动,但也是在城市中,人们表达不包容性,因为他们不喜欢与那些生活方式、语言、宗教不同于他们的陌生人离得太近。

为什么城市会有这么多悖论呢?是因为我们有 David Harvey 说的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吗?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共同点,如社会民主。还是仅仅因为城市是一个超越了所有时代人类极限的、非常大的人类聚居区?还是像 Henri Lefebvre 所说的,有“城市”(urban)的条件就会催生这些悖论——无论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样的。

(二) 土地与权力

如果大家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在任何形式的人口聚居地——尤其在城市中,土地是权力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城市里面究竟衍生了什么样的权力?我们有生产和消费的整合带来的权力。城市里总有各种各样的生产,城市的巨大动力来源之一就是整合生产和消费的能力,这种整合能够在特定的土地区域上发生,然后成为控制土地的人的权力来源。城市也是由交易控制的地方——无论这种交易是商品的还是资本的。因此,许多城市中的权力(power in the cities)以及城市权力(power of cities)是建立在偏远地区和城市政府的整合的基础上的。换言之,城市实际上是整合各种类型的全球流动的

一个前端或节点。但城市中往往有一个永恒的权力架构在控制着土地。个体不断地变化,但是基本的控制土地的机构几乎没有变化。

我的朋友 John Logan 和 Harvey Molotch 于 1986 年发表的《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City as a Growth Machine)把城市看作一个推动增长的机器,这种增长是基于一个对土地进行开发、再开发、重新开发的连续过程,涉及新的用途、人群、经济,但是一直不变的是控制土地的权力架构,它决定什么活动会成为这个增长的一部分。或许每个社会中的机构不太一样,但通常这种永恒的权力架构包括城市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土地的所有者——在欧洲、美国、中国的城市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组合,它们的权力份额分配可能不同,但是城市未来的增长正是取决于这三个群体所做的基本决定。所以,在城市里有这样一对非常有趣的权力架构的组合:政府的权力架构统治着某块领土(Rule of territory),但金融的权力架构控制着上面的土地(Control of land),而在有些情况下会有一个永恒的权力架构不仅统治着领土而且控制了土地。如果整合了这两种形式的权力,就有可能产生非常强有力的社会整合——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当其权力非常强大的时候,这种永恒的权力架构如何能够创造包容性?如何能够创造社会的可持续性?

(三) 美学愿望? 超越(Transgressive) 还是固守(Conformist)?

在布鲁克林绅士化的街区中,我在一家餐厅门口看到过一张非常奇怪、激进的油画。这幅画代表了什么呢?是代表了某种文化革命吗?还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美学?但是在同样一个社区,仅仅几条街之外,就是另外一种美学——我们所熟悉

的、在上海或者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都能看到的情景:人们穿着黑色T恤、坐在大的木质桌子边、在笔记本上工作,喝着啤酒或咖啡等等。这是同一个城市中的同一个社区,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同一社区中的不同文化?这个社区里的人们想要什么?

又或者是非常时尚的书店,或者一个因为没有取得经营许可证而关闭的小商店。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些店铺吗?它们能超越什么”?这两个空间中蕴含的抗争(rebellions)是什么?是它们的美学吗?或者它们的社会功能?还是人们想要在这两种空间中表达的某种东西?他们是想要表达一种对更加包容的城市文化的需求吗?

(四) 城市能否支持人们的愿望?

人们想要什么?我们怎样发现人们想要什么?以及怎么样才可能通过他们的愿望去塑造包容和可持续性?我自己的思考认为,当人们希望建成一个美好的城市,需要实现四个主要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拥有自由的空间。人们能够在这些空间里面展现他们认为代表了“自由”的行为——社会生活的自由。

第二个目标是一直以来人们移居到城市所追求的——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生活并且生活得更好,拥有更好的居住条件、交通条件,以及所有好的城市规划能带给他们的益处。

第三个目标就是参与到城市生活这个大舞台中,观看街道上的行人、观察和体验所有城市移民和居民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人们有时候通过品尝来自不同地方的食物、逛不同的商店、在公共空间中与来自其他地方的人们待在一起来感知这种多样性,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发生在城市中。

第四个目标就是人们对于原真性的

追求，这在我《裸城》(Naked City)一书中曾提及。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愿望，我们一方面知道城市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希望与他人建立联系、扎根于社会。这个目标乍一看非常简单，但其实非常复杂。原真性要求：1) 建立本地的社会网络、本地的相互依赖性，这样人们可以获得本地的认同。在欧洲和美国的都市里，这种在本地生活的归属感非常强，但在中国却不是那么强——你可能会说，你住在市中心、住在郊区、住在这个或那个区(District)，但是你不会住在某个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定的社区(Neighborhood)的感觉；2) 要有稳定的住房(Secure housing)。房屋所有者和租户的感受有所不同；3) 应该有某种形式的社区连接，使得人们感觉到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4) 还需要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本地社区具有自主性。

但是城市是否真的具有自主性？以纽约为例：外商在纽约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比例非常之高——在外国投资者拥有纽约如此多的房产的情况下，普通的纽约市民能否决定他们自己的社区事务呢？在我们总是如此关注像“创意城市”、“创新城市”这些口号的情况下，人们有没有自主性？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社会住房给人们去住，他们当然不能产生“自主”的感觉——在纽约，如果出现更多价格高昂的、私人所有的公寓，对于租户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就没有“自主”的感觉。又如果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在其中人们以投资为目的购买公寓并且短租出去，对于这些人的邻居的自主权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是美国、欧洲城市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在中国也同样如此。

美国不仅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还有非常强有力的州政府，州政府控制着城市的政府想要控制的很多功能，包括房屋租赁、公共交通、教育等领域，

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依靠州政府制定的政策来生活。在纽约的社区中，我们看到市场力量驱动的绅士化——当地政府并不想逆转这样的趋势；在上海或许存在一种由市场、政府和建筑业主三个因素驱动的，通过新资本、新用途和新移民流入某些特定的区域带来的复合的绅士化。

三、“智慧”(Smart)的城市会具有社会可持续性吗？

我不知道是否一个智慧的城市更好。例如纽约大学试图推广自己的技术机构，所以它用自己私有的公交车运载自己的学生和教职人员到各个地方，敦促所有人去“创造些什么”——但相对于普通人，他们可能更自主。

我认为，智慧城市真的应该由人们的愿望来控制、而非“什么对人们有益”这样一种抽象的观念来控制。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检视那些目前在所有城市中都在讨论的观点：什么是创新街区？朝着智慧城市、创新城市发展，对于大公司、小公司和个体分别意味着什么？但是不管是在上海、巴黎、伦敦，还是世界上的每一座城市，这都是城市管理者所追求的成长方向。

以上就是我想留给你们的一些启发性的问题，未来无论面对创新城市、还是智慧城市，都需要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翻译、编辑：邓世碧

审校：钟晓华

艺术地包容：通过公共艺术发展包容的新加坡

张道泉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副教授

“可持续与包容性发展”是今年城市与社会论坛的主题，所以我尝试从这个角度来谈谈公共艺术和公共项目如何能够帮助人们感受到包容性。每当提到公共艺术时，我们往往想到著名国际艺术家的纪念碑和雕塑作品。但在新加坡，公共艺术正越来越从国际艺术家和著名雕塑转向我们所称的街头艺术和社区艺术，这些艺术由人们所创作、为人们所享有，它们往往是由不知名的广大艺术家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创作的。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非主流艺术家创作的非主流艺术，而包容性也蕴含在其中。

新加坡有两种包容性的文化。首先是街头艺术，可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人居住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这样的民族街区、或者铁路走廊（the Rail Corridor）看到。在上海和北京也会看到类似的街头艺术。

第二种我们称之为社区涂鸦，通常在公共组屋的一楼可以看到。8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这种高层建筑里面，一楼的墙体成为社区艺术的空间，而不是空白的墙面。

我主要聚焦在社区涂鸦上，探讨这些艺术作品是怎么从我们所谓的“创造性场所营造”中产生的。创造性场所营造的概念试图囊括大众成员、由艺术家培训他们在普通的日常景观当中进行艺术创作。

一、背景

包容性规划不是一个新概念。20世



图 1、创造性场所营造活动

纪 70 年代以来，社区艺术、或参与式艺术的理念描述了艺术如何能够将社会连接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城市艺术运动中的“社会转向”。当谈到社会转向，我们讨论的是社会、市民是如何参与到城市再开发中的，而不仅仅是政府规划者、或精英、官员。这样做会产生一种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感觉，也有一些技能训练和提升。

近几年出现的“创造性场所营造”的活动，是一个空间转向和艺术运动。这种空间转向的主导不是政府，而是艺术组织当中的艺术家。在政府的资助和建议下，艺术家或艺术组织让公众参与进来，培训他们、招募他们作为志愿者并参与街头艺术。整体目标就是通过画画让人们聚集在

一起、认识自己的邻居，同时他们会感觉在共同为环境做一件事情，在景观中就会产生一种社会联系感。在一个产生巨大变化的社会里，至少你可以说通过共同创造和美化这个景观的过程，你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了。（图 1）

二、三个“组屋底层画廊”的包容性艺术

例举三个新加坡画廊的实例。在粉刷之前，墙上没有任何东西，它们只是一楼空旷空间里的一面空白的墙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经变成了画廊，而艺术家正是那些住在楼上的人。这三个组屋底层画廊分别位于麦克弗森（Macpherson），波那维斯达（Buona

Vista) 和玉宝苑 (Gek-Poh Ville) 三个公寓的一楼。可以看到, 这些涂鸦的风格从印象主义、波普艺术到立体主义, 风格各异。(图 2-5)

要探讨三个问题: 首先, 政府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以及政府是否真的处于次要地位? 我们都知道, 在新加坡政府总是占主导地位, 很少有项目中政府会退居二线。第二, 在与社区和邻里的合作中, 艺术家以及艺术组织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最后, 我曾经和这些在墙上绘画的艺术家交流过, 问他们: 是否感觉和邻居们联系在一起了; 居住在他们自己创作了艺术作品的空间中, 他们是否有归属感? 首先我将从政府说起, 之后我们再聊聊艺术机构, 最后是艺术家们。

(一) 政府视角: 包容性政策?

对于政府来说, 这些房屋的空白墙壁似乎是把社区凝聚在一起的绝佳机会, 不仅能将居民聚集在一起, 还给予居民通过艺术和文化表达自己的机会。政府把团结、招募和培训居民的角色交给艺术组织, 而不是由政府自己来做这件事。艺术组织是非政府组织, 基本上会招募成百上千的人在墙上作画。不过, 在做了一些研究后, 我想说, 政府不是被动的。在社区涂鸦创意的概念形成中, 新加坡政府持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我采访过一位国会议员说, 她是第一个提出在麦克弗森设立组屋底层画廊的政治家。她是这样表达她设立组屋底层画廊的想法来源的: 空间是如此安静空旷, 非常适合艺术表达。她环顾所在的公寓, 决定把重点放在 C 区。C 区的人们非常乐于接受新思想, 而且它位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点——它是社区的入口。她认为, 她能通过这些艺术品提高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在之后与政府官员交谈的过程中, 她明确了艺术作品的战略目标: 是人们表



图 2、粉刷前的空白墙壁



图 4、波那维斯达: 波普艺术 (2012)



图 3、麦克弗森: 印象主义 (2011) 3



图 5、玉宝苑: 立体主义 (2014)

达自己的机会, 也是提高整体生活水平的机会。但她选择组屋底层画廊的地点也非常有战略意义,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人们看到它的地方。

既然政府选定了地点, 是不是由公众来选择涂鸦的风格呢? 比如这里的梵高和印象主义, 或者其他地方的毕加索和波普艺术。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画廊里面的梵高风格的作品是由这位国会议员选定的。她说她也曾考虑过是否应该让居民自己选择艺术风格, 但是因为这毕竟是新加坡第一个社区画廊, “最好由我来做决定, 我会选择一个人们都能辨认出来的著名艺术家创作的经典艺术作品, 而不是给予绘画者、艺术家和居民全部选择权”。所以, 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的艺术, 在座的各位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采访过议员以后, 我意识到政府角色并不是被动的。在营造场所的过程中, 尽管按道理应该是艺术家和艺术组织来主导决定画廊的概念、地点和艺术作品, 但实际上还是政府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二) NGO 的立场: 与社区合作?

第二点, 我想讨论一下非政府组织的立场。这是一个艺术组织, 叫做“社会创意”, 它的目的就是让新加坡人开始画画, 从而使他们为了产生参与感, 并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总的想法是让新加坡的墙壁色彩斑斓, 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视觉和情感上都是和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然而, 为什么绘画可以带来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呢? 因为实际上绘画的艺术家们并没有参与任何决策过程。我问那个艺术组织: 你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说,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着色书的概念”——艺术家在墙上画轮廓, 然后用数字 1、2、3、4 来编号, 之后由公众成员进行上色。比如 1 号是蓝色, 他们就画蓝色, 2 号是绿色, 他们就画绿色, 所以居民很少有创造的空间。实际上专业的艺术家们负责画开始的 20% 和最后的 20%, 公众只需要做中间的 60% 的部分——在空白处填入颜色。确实, 你可以看到公众的参与, 但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只是填满空白的墙面, 而

不是做一些更有创意的决定。所以我再一次问了“社会创意”的创始人,他说,“艺术应该是快乐的,所以我们只想要快乐的作品”。不过梵高自杀了,对吧?所以艺术并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这位创始人的想法是,“我不会创作任何黑暗的艺术作品或者向新加坡人介绍任何黑暗的艺术作品,而是创造出色彩斑斓的、快乐的艺术。(图6)

因此,我质疑这整个包容性艺术的概念。首先,这种艺术是包容的吗?公众成员只是按要求填色,而不是决定在哪儿画、画什么、如何完成艺术品。第二,我甚至质疑这到底是不是艺术。有人会说这些只是装饰品,不是艺术,因为艺术应该激发人的思考,艺术不一定要是快乐的,艺术应该是思想的表达。如果你心情不好,你会以特定的方式去绘画。

(三) 社区经验:归属感?

最后,关于参与绘画的社区。在某程度上,一些结果是可预测的。许多艺术家说,“因为和邻居一起画画,现在我认识了我的邻居,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对我来说不再陌生。我现在坐在这个画廊里和邻居交谈,因为这是一个更加有益的(conducive)环境”。

然而,有趣的是,我没有料到许多居民问,“为什么没有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个地方建社区画廊呢?为什么没有询问我们这里画的是梵高的还是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波普艺术、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为什么这些作品都来自外国人之手呢?有没有可能在新加坡的空间的展示新加坡的艺术特征呢?”因此,我与参与绘画的艺术家们交谈,他们说,“我们可能难以欣赏欧洲或美国的艺术作品,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能在社区画廊里看到熟悉的新加坡形象,比如渔民,新加坡猫和胡姬花。既然新加坡一直致力于建设创意城市,也



图6、涂鸦创作中

许我们应该鼓励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推广欧美艺术作品。”

我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你将来还愿意继续参与社区涂鸦创作吗”?不幸的是,80%的人会说:“不,我不想再次参与了,因为我并没有真正交到朋友。确实,我因此认识了我的邻居,但在绘画时间里,我们的互动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识到新朋友。我们基本上只是被动地画背景,而不是进一步了解艺术。我们只是自愿的、免费的画家,所以我不会再做第二次。”

三、总结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一个被认为应该是包容性的空间:新加坡组屋底层画廊——公众绘制的公共画廊。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愿者在城市中绘画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很多城市都有,包括七十年代以来的亚洲城市。就新加坡而言,新的点是这些画廊存在于郊区而非市中心,存在于居住环境中而且艺术家是居民本身。我已经介绍了创造性的场所营造这一概念,即公众参与美化自己的居住环境,同时结

识他们的艺术同侪。

我考察了三个要素:政府、艺术家及艺术组织、居民。政府并不是扮演被动的角色——新加坡政府在创造性的场所营造过程中依然扮演着主导角色,虽然事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创造性场所营造应该由艺术家和艺术组织主导。某种程度上艺术家和艺术组织是有主导作用的,但是问题是他们真的把公众纳入进去了吗?以及他们是否真的在创造艺术、而不仅仅是涂鸦和装饰?关于居民,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考虑、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画的不是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居民会说“我不想再次参与”,这些事实都给创造性场所营造的过程带来了反思。

录音稿翻译:方沁文

编辑整理:邓世碧

审校:钟晓华

“2017 遗粹影像摄影展” 入选作品

王博 | 喀什的人与城





8月的喀什，酷热难耐，古城里游走的我们，竟然遇到一场在喀什难得一见的大雨，老城排水很差，很快积水成河，孩子们兴奋的撑起破烂的雨伞在雨水中奔走欢呼。在喀什高台民居，土陶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六代传人，吐尔逊·祖农，正在向我们介绍流传百年的土窑和自己引以为豪的手艺。之后，土陶制作成为我们“喀什高台民居保护规划”的重要文化要素。站在喀什高台民居北侧的空地上，朝北按下快门，是一片值得思索的旧貌，关于古城保护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求精·做实·解难·创新

同济规划简讯

TONGJI PLANNING NEWSLETTER

发行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编

周俭

副主编

张尚武

编委

周玉斌、王新哲、肖达、李鹰、王颖、俞静、梁洁、马强、罗志刚、阎树鑫

顾问

戴慎志、李京生、潘海啸、孙施文、唐子来、童明、王伟强、赵民、张松、朱介鸣

设计 | 文编 | 校对

贺飞 | 顾鲁燕 | 叶萍

免费订阅

可通过邮箱订阅 news@tjupdi.com

可通过电话订阅 189-6418-8992 宣传办

来信明细：姓名、公司名称、投递地址、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上海市中山北二路1111号 同济规划大厦

邮箱：net@tjupdi.com | 网址：<http://tjupdi.com>

创刊

2010年9月

封面图片来源

"庭院街区"——大数据支持下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公共活动空间网络规划